

中国迎来锻造“金融资本力”时间窗口

章玉贵

金砖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既是整体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的金砖五国致力于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通过国际性经济与金融合作平台,锻造本国的“金融资本力”,进而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成立金砖银行与应急基金及时且必要

一个具有区域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既需要成员国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又离不开相关力量工具的发育,更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变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备受关注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来得及时且必要。从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的首次会晤,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到2010年12月正式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而演变成“金砖国家”,再到本次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短短5年间,这个曾被广泛看好其后又经受唱衰言论困扰的特殊合作机制,其取得成果速度之快,合作范围之广,格外令人瞩目。此次选择在巴西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大国巴西

发布会晤成果,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

13年前,当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概念时,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机制化合作平台会搭建得如此之快。美国和欧洲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依然相当牢固,IMF投票份额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兑现。本来,按照2010年IMF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IMF的总份额将从2384亿特别提款权(SDR)增加到4768亿SDR(约合72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出资比重将显著增加,欧洲把持的董事席位将由24个减少为22个,让出的2个席位留给发展中国家。在投票份额方面,根据该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996%大幅上升至6.390%,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806%升至6.068%,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的IMF第三大份额国。但由于改革方案涉及修正IMF协定,并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而作为IMF最大股东、投票权占17%的美国迟迟不肯批准。201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公布法案,拒绝就IMF 2010年改革方案负担新增出资份额。IMF改革案如需生效,还得等到明年美国国会批准。如果方案被否决意味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

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的希望近期无法达成。对此,IMF总裁拉加德除了发表声明感到失望之外别无他策。美国之所以一再阻挠IMF改革,既是为了延长美元红利期,也是利用既

有国际框架钳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扩充行为空间。在美国看来,货币作为美国主宰全球战略资源分工的最后堡垒,是美国难容他国染指的超敏感地带;IMF作为美国主宰国际金融秩序的权力符号,其战略价值对美国而言实在太大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战略是在英国的积极配合下,确保对全球金融秩序的主导权与金融产品的定价权,一方面绝不容许资本主义体系内出现可以挑战美国的统一力量;另一方面,借助国际金融资本,设法遏制近年来积极寻求不断扩充行为边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

如今,金砖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既是整体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的金砖五国,致力于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通过国际性经济与金融合作平台,锻造本国的“金融资本力”,进而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锻造中国和金砖国家的“金融资本力”

犯了力量使用过度错误的美国,如今无论是相对经济实力还是基于机制化霸权的金融影响力,与2001年相比,均有显著下降。当年强大到有点寂寞的美国金融资本,在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依然是全球占主导力量的实质性存在,但来自金砖国家的力量工具发育正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快速增长。以经济规模成长来说,2001年,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17万亿美元,金砖四国的经济总和不足美国

的四分之一;12年后的2013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

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汇储备大国与贸易大国。

从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的精英意识不断上升的上述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正是这种逻辑安排的自然表达。

对中国来说,上海作为金砖银行总部,既为上海发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打开了新的窗口,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建设,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期来看,上海的金融地位有可能类似于法兰克福在欧洲的金融地位。而中国对应急储备基金最大份额的贡献,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国际责任感担当的应有表达。中国和其他金砖成员国要做的是:如何通过细化机制化合作平台,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贷款与金融救助菜单,如何在协调好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就在全球经济治理拿出可执行的改革方案,如何在稳步推进本币国际化的基础上,嵌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打造国际多边货币稳定机制。最终目的是通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与相关服务,萃取出新的发展模式,锻造中国和金砖国家的“金融资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财税核心改革 应避开楼市敏感时期

任寿根

改革开发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依旧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财税体制改革与创新是无法回避的,政府应下决心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但当前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远非昔日可比,尤其是财税体制核心性改革,需要政府更大的智慧和策略解决。

核心是改革并重构地方税体系

据媒体报道,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为三个方面,其中包括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优化税制结构、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方面。

上述三个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契合了当前中国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避或绕开财税体制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成效。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继续选择财税体制,这是由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所决定的。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和城市发展极化问题严重,大量人口和生产要素过度向东部一线城市集聚,新城城镇化必然进一步加剧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极化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小觑;二是产业发展极化问题严重,生产要素过度向少数行业集聚;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亟待缩小。解决这三个“结构性”的问题,必须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那么,当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当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税体系。财税体制改革涉及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个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跨出每一步都应考虑到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20年来中国税收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分权,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因为政府分工有助于提高效率,信息对称性也要求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职权。在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前提下,构建完善的中央税体系与地方税体系便成为重要事项。从中国情况看,经过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20年来中央财政实力得到大力增强。现在的地方问题是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地方税体系主体税种的设立不合理,尤其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均过度依赖增值税等共享税,不易化解财政风险;一旦出现财政收入风险,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会同

时受到重大影响。而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中长期的结果是地方税体系必须重构,必须寻找新的主体税种弥补营业税逐步消失的收入空间。此外,未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进

一步加剧目前已经存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求矛盾。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创新和改革财税体制的核心是改革并重构地方税体系,建立市场型地方税收体系。

核心改革面临的 最大困境

当前中国财税体制核心改革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整体性风险。

改革并重构地方税体系,建立市场型地方税收体系,必须确立新的主体税种。从理论上讲,地方税体系的核心是财产性税种。而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看,中国推动财产税制度改革应该慎重,应该注意时机的把握,应该注意改革的节奏和时间安排,应该避开房地产市场风险时间。

从美国经济情况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20年增长期。据美国劳工部7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连续第5个月保持在20万以上水平;当月失业率降至6.1%,为2008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美股的强劲表现一方面表明投资者对美国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为增加美国居民个人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足够的保障。美国经济复苏,美国货币政策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在适当的时间加息,即由宽松货币政策向中性货币政策转变,再由中性货币政策向紧缩性货币政策转变。而美国货币政策的逐步转向对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均会产生重大影响。近期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隐含着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逐步转向,对全球资金量供应会产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未来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或面临一定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7月7日公布,5月新增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仅3.61亿元,环比下降9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热钱正在流出中国,这也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有媒体报道,济南新房与二手房限购政策将全面放开,不管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在济南买房都没有套数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济南实施了3年多的限购政策将正式退出房地产市场。另据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建住宅签约套数和成交面积均创下近9年同期最低。同时,近期北京期房和现房住宅合计库存再次超过8万套以上,创下近18个月新高。这些都表明,房地产市场隐含的风险不可小觑。

有学者指出,包括房产税改革在内的财产税制度改革不仅对房地产市场不会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助推房价。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日本从1992年开始实施具有财产税性质的地价税,而地价税的实施,成为导致日本房地产市场崩盘的直接性因素之一,最终迫使日本在1998年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征地价税。

中国应当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在财产税制度改革方面,应密切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避开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敏感时期。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

三一集团涉美诉讼初胜的思考

黄磊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月15日裁定,中国三一集团与美关联公司罗尔斯(Ralls)在风电项目中具有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达的相关禁止令有违程序正义。这意味着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在美国获得阶段性胜利。

三一携罗尔斯投资风电项目,原本郎情妾意、幸福美满的企业联姻,却被不该管的奥巴马政府这“黑婆婆”插上一脚,禁止通婚!不可理喻的根子还在“婆婆”恣有多疑臆想式过激症。当然地发病并非第一遭,之前的华为、中兴这些“大姑娘”都还在“谈恋爱”的阶段,就被她一棒槌打跑,动机很简单却充满臆断——她们姓“中”。

这在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下,在崇尚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的美国文化理念中,无疑只会让更多的美国人蒙羞。这种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猜忌,恰如戴上山姆家族祖传的“有色眼镜”,对他国投资者的莫名敌视和排斥,无异于给美国自由女神像蒙上了厚重的黑纱,并缠上一道长长的裹脚布。

万幸的是,奥巴马政府不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尊重财产权、恪守程序正义早已写入到美国宪法中;可喜的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也渐加成熟、越加自信,

更加懂得寻求法律武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应争端。也正因为此,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在美国获得阶段性胜利,它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一次官司成败。

其一,在美国外资委员会(CFIUS)的各种政治洁癖下,其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展的“秘密审查”程序,相对于投资商方提供的各种说明材料、所履行的各种程序,两种透明度显然有天壤之别,用中国古语来说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次巡回上诉法院判决中要求政府提供的程序正义,无疑是直接苛责之前非对称、不公正的“秘密”程序。

其二,在全球化的市场背景下,国际间资源的整合与双赢,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已经逐渐完成资本积累、亟需技术整合、渴求发展资源的中国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其确定的判例,具有其司法范围内的法律效力,而这种法律效力,对于走向美国的中国企业来说,显然具有借鉴和援引的应用意义。

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纵然可恶,但其所秉承的国家安全第一理念值得我们对比和反思。对于涉及到我们国家安全的项目,我们是否盲目地开放了市场空间,又是否有如美国外资委近乎苛刻的审查程序?还是一言堂拍板了事?再进而言之,当政府决策出现偏差时,我们是否还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补救?这些显然更值得我们深思。

定向微刺激且行且珍惜

项峥

为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前段时间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定向微刺激政策,目前取得了初步成效。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已连续4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延续了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4.7%,增速比上月末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146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4%,其中二季度增长7.5%。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逐步好转的态势。

尽管如此,应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定向微刺激政策密集出台还难以形成下半年经济自主回升动力。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应倍加珍惜国

家系列定向微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短期稳定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主体要主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培育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应该看到,宏观经济增长表现要受到生产要素及其结构内在调节与平衡的制约,在科学技术未出现重大进步之前,一国社会总供求失衡,主要源于供求结构的错位与调整,使得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在均衡增长率之间小幅波动,进而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操作依据。尽管如此,国家干预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还要受到经济体市场容量与社会供求结构制约,不能想GDP增长多高就多高,否则就是违背经济规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史无前例采取一致行动,对宏观经济进行了较大规模刺激。但5年多过去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至今不明朗。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刺激政策并没有涉及结构调整,未能根本消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根源,即新兴经济体国

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7.4%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经济增长略放缓,各行各业冷回暖。稳中有进调结构,热后降温数地产。国内销售稳增长,出口贸易渐反弹。解读经济半年报,未来走势不悲观。

家出口战略导向与发达经济体消费泡沫、过度福利化倾向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刺激政策,不管是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只能带来短期增长效应,且边际政策效应期衰减。这是因为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调整总供求关系,但无法改变总供求演变的中长期趋势。且每一次政策刺激后,相关产业部门均会形成某种程度路径依赖,使得下一次政策刺激的成本急剧上升,导致政策刺激边际效应递减。因此,经济刺激政策,存在经济体制与结构以及时间的多重约束,需要“且行且珍惜”。

现阶段,我国经济仍需要定向微经济刺激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是经济内在调整,属于正常现象,但经济变量背后是社会就业和社会福利变化,影响到社会相当数量人士的基本生活状况,不能不妥善应对与处置。而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将“不跳出保证社会充分就业”的增速作为宏观调控下限,有着极为

现实考虑。今年以来,以“微刺激”和“定向刺激”为两大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的、正向的作用。在过去“大水灌溉”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期待中的普惠并没有出现,而是被部分企业、少数产业截留,表现为更多的社会资源流向房地产行业,造成房价过度上涨。而“微刺激”和“定向刺激”已经框定了刺激的规模和方向,有助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定向微刺激”政策不能改变货币政策的“稳健”总基调。我国庞大的货币供应总量,始终是高悬在实体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这些年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使得物价形势总体可控,但房价上涨也存在与物价全面上涨类似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效应,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环境还存在一定的“定向微刺激”政策空间。但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就有可能逐步丧失未来可行的政策刺激空间。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